

# 元朝末年的绍兴行御史台及其与周边群雄关系研究

邓文韬

**摘要** 绍兴行御史台是元朝御史台设置于绍兴路的派出机构，其存续年代为1356-1366年；其职能则为监察江南诸行省吏治和负责吴越地区的军事镇遏。绍兴行台存续期间，吴越地区呈现张士诚、朱元璋与方国珍等群雄逐鹿的历史格局。作为元朝官方在绍兴地区的权力代表，行台与周边各支群雄势力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政治军事关系。张士诚政权通过派遣吕珍进驻绍兴，完成了对绍兴行台的军事“保护”，同时还侵夺、干涉与利用行台的人事权力。朱元璋政权与绍兴行台间存在激烈的军事与人才竞争，绍兴行台及其分台治所三次被攻破皆系朱元璋政权所为。方国珍政权与绍兴行台之间看似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在某些政治立场与军事行动方面存在默契，但方国珍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涉行台事务。要之，绍兴行台在与周边群雄政治和军事博弈中均处于下风地位，最终覆灭于朱元璋的军事进攻之下。

**关键词** 元代御史台 绍兴路 方国珍 张士诚 朱元璋

有元一代，中央官署在各地派驻分支机构的现象较为常见。在吴越地区，元朝主要的派出机构有江浙行省，江南行枢密院、江南行御史台、江南行通政院、江浙行宣政院等，这些派出机构大多驻于长江两岸的建康、扬州、镇江或是南宋故都杭州。只有江南行御史台曾在元朝末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短暂驻足于绍兴路，成为了元代绍兴地方官署中唯一的中央派出机构。

元朝中前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江南行台主要发挥其监察功能。至正十一年（1351）以后，农民战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元朝控制下的吴越地区亦受到多支反元武装的威胁。绍兴行台作为凌驾于本路总管府之上的中央派出机构，不得不出面与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群雄周旋，勉力维持元朝官方在绍兴及吴越地区的统治。由于元末相关史料较为分散，学界关于江南行台的研究主要以元朝中前期为主。<sup>①</sup>有关元末绍兴行台尤其是它与周边群雄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还尚未得见。笔者拟对此问题予以考察，并探索绍兴行台最终覆灭之原因。

## 一、绍兴行台建立的历史背景

行御史台是元代重要的地方监察机构，元朝统一中国后，相继建立了御史台、江南行台、河西行台、云南行台和陕西行台，以分管全国十一省的监察工作。

在四处行台中，惟江南行台存续时间最久，其下辖湖广、江西、江浙三省十道，监察范围为除云南行省与四川行省之外的整个南方地区，在元代监察制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座始置于至元十四年（1277）的官署，最初将治所设置于扬州路（今江苏扬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移治南宋故都杭州路（今浙江杭州）。次年（1285），朝廷又因江南行台与江浙行省治所皆在杭州，存在功能冲突以及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而移至江州（今江西九江）。至二十三年（1286）夏四月，江南行台治所最终被固定在建康路（今江苏南京）<sup>②</sup>，历七十

<sup>①</sup> 详见（日本）梶一昭：《元朝江南行臺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54卷4号（1996年）；李治安：《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日本）工藤健：《元代の江南行台について--その歴史の展開に関する一考察》，《北大史學》第43卷（2003年）。

<sup>②</sup> （明）宋濂：《元史》卷九十二《百官志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34页。

年之久不变更治所。

时至元末，朝廷的统治秩序随着红巾军淮泗起兵而逐渐崩溃，群雄并起，各地涌现出若干支反元力量，而其中对元朝威胁最大者，则莫过于朱元璋的武装。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与濠州红巾军首领郭天叙、张天佑自和州（今安徽和县）渡过长江，先后攻破太平府（今安徽当涂）与江南行台治所集庆路（由建康路改名而来），杀死行台首官御史大夫福寿，江南行台遂沦于朱元璋政权之手。

为了保证江南地区的监察工作能够正常运转，朝廷不得不于当年九月委任本来已经致仕，在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家中养老的前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高纳麟牵头重建行台。彼时，张士诚已进占平江、松江、湖州等地，而集庆路周边的常州、江阴、宜兴等地则沦为朱、张两军拉锯战的战场，均不能确保安全。所幸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杨完者在嘉兴与杭州两次击退了张士诚军队的进攻，故而朝廷只得选择将行御史台驻地转移到了位于杭州以南的绍兴路。纳麟到任绍兴后，将本路总管府迁往原南宋绍兴提刑司官廨，而将故总管府官廨作为台址，并遴选台官，于十二月正式开台署事。到1366年十二月绍兴路被朱元璋攻陷，江南行台十年驻镇于绍兴路达十年之久，这就是本文所谓的“绍兴行台”。

绍兴行台成立之际，正值红巾军起义的高峰期，元朝遭遇到了定鼎中原以来最为严重的统治危机。除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定都于此的朱元璋以及盘踞平江路的张士诚，在浙东的温、台两地，还有揭竿而起的盐梟方国珍，整个吴越地区呈现出群雄逐鹿的历史格局。由于前述安全原因，行御史台最终被安置在了绍兴，其地缘政治格局较为复杂，北临张士诚，西毗朱元璋，东面则受方国珍的威胁。各支势力对元廷叛服不常的政治态度，致使他们与绍兴行台间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复杂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半独立性质的中央派出机构<sup>①</sup>，绍兴行台为完成其按治诸省，监临各道和镇遏江南军事的职责，与各支群雄势力亦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关系，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维护元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

然而，如同元朝派驻江南的其他官署一样，绍兴行台在与元末群雄打交道的过程中多处于劣势地位，其权力被侵夺，活动受限制，甚至连军事力量也难以保留。时人题于行台大门上的“二十四官徒獬庆，越王台上望金陵”<sup>②</sup>，便是讥讽南台空有光复集庆路旧治，却无力完成夙愿的无奈。以下试分别对绍兴行台与张士诚、朱元璋与张国珍政权的关系作探讨。

## 二、绍兴行台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

元末江南群雄中，与绍兴行台关系最为密切的群雄是至正中后期盘踞于平江路的张士诚。

张士诚原为泰州白驹场亭盐贩，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兴化起兵反元，攻克高邮府城，自称诚王，建立大周政权。随着元丞相脱脱组织的镇压大军在高邮城下作鸟兽散，张士诚彻底坐大，势力渐长。绍兴行台成立之同年，张士诚政权概已自南通州渡过长江，攻陷平江、湖州、松江及常州等地，占据了浙西地区。元朝在无力剿灭张士诚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招诱政策，封张士诚为太尉。而张士诚虽然在名义上归附元朝，但仍保有实际意义上的独立地位。

即便如此，名义上的“元臣”身份，还是能够减轻江南地区原来忠于元朝的官僚士大夫改仕张士诚之际所面临的道德压力。一批遭遇军事失败而走投无路的江南行台官员，遂选择了归附于张士诚。早在朱元璋渡江攻打集庆路时，被常遇春击溃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时任元朝水军统帅）就选择率溃军顺流东下，“走投张士诚”<sup>③</sup>，以寻求庇护。

为了保卫绍兴行台周边地区的军事安全，实现行台的镇遏职能，首任绍兴行台御史大

<sup>①</sup>此处谓绍兴行台为“半独立”机构，盖因元末吴越地区官署与远在大都的中央政府因中原地区群雄并起而道路不通，风信隔绝。在此情境下，中央通常委任吴越地区各派出机构高官“便宜”行事，自行施政。加之绍兴周边郡县长官亦皆拥兵自保，甚至与行台出现冲突，足可见其政令不一，各自为政。

<sup>②</sup>（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讥省台》，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307页。

<sup>③</sup>《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二月庚寅”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第42页。

夫高纳麟征召了一支“台军”<sup>①</sup>，将其作为绍兴行台麾下直属的军事力量，并设镇抚司予以统辖。然而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时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拜住哥与同僚手足相残，诱杀了行枢密院判迈里古思，招致迈氏部将黄中的复仇。拜住哥所统帅的三千台军一败涂地，两营被屠，黄中“尽杀拜住哥家人及台府官员掾史，独留拜住哥不杀，以告于张士诚”，士诚遂趁虚而入，“乃遣其将以兵守绍兴”<sup>②</sup>，完成了对台城绍兴路的军事占据。

次年（1359）二月，朱元璋属将胡大海开拔至绍兴城外，准备攻城。绍兴行台御史大夫庆童无兵可用，只得倚仗张士诚属将吕珍所统帅的武装力量，“行台官属皆集卧龙山上”以避战。从《保越录》所记载的战争过程来看，行台只是发挥了赏赐、犒军，提供后勤以及祭祀祈祷等有限的作用<sup>③</sup>。相较于前任御史大夫拜住哥统辖的三千台军，庆童只拼凑出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军队，“命元帅秃满迭儿，以帐前军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吕珍）军前听调”<sup>④</sup>。将台军交由吕珍统领，意味着庆童与绍兴行台已然放弃了独立军事指挥权。

庆童离任后，张士诚进一步攫取行台军权，“庆童罢去，继居台端者非材，台城内乱。先是，泰州张氏据苏、湖、松、秀等郡，杭、越犹听行省节制，于是遣其部将据台城，台纲遂弛”。如原本为庆童所提拔，负责守卫台城的平江等处水军副万户叶应槐“亦失兵柄”<sup>⑤</sup>。台城遂完全沦于张士诚的军事保护之下，江南行台本应承担的“镇遏”职能丧失殆尽。

在攫取绍兴行台军权的同时，张士诚还不忘对行台进行政治胁迫。追求王爵是降元以后张士诚的主要诉求，在“令其部属自颂功德，求王爵”失败后，张士诚于1363年九月自立为吴王，并“讽行台为请实授于朝”，即希望绍兴行台为之向远在大都（今北京市）的朝廷申请册封，但遭到时任行台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的拒绝。张氏“即使人至绍兴，从普化帖木儿索行台印章。普化帖木儿封其印置诸库……乃仰药而死”<sup>⑥</sup>。御史中丞月鲁不花的施政也同样受到了张士诚的掣肘，“时宪台多故”，“惟藩府跋扈，方伯莫制”，“公绳纠以法，厥惟艰哉”<sup>⑦</sup>。

此外，张士诚还试图干涉江南行台的用人权。徐一夔《送笃禡平章还燕序》记载：“初，张氏之有浙西，其于元室阳顺而阴悖……于元官尤慎防焉。凡授官于其境者，则扼使弗上，或调官他境，而道过其地者，则留而弗遣。或有阿顺取容而得收用之者，则必易其官而官之，务抑遏其志。如逼杀南台大夫而强公摄行台事之类是己”<sup>⑧</sup>。可见，在逼杀普化帖木儿后，张士诚挑选了原江浙行省平章笃禡作为傀儡，这表明绍兴行台存续末期的官吏选用权已严重被张士诚所侵蚀。

为了摆脱张士诚的政治影响，元朝于1365年在福州路设置了绍兴行台的分台，令绍兴行台所辖诸道廉访司经由福州分台，通过海道向大都御史台传递文书。虽然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声明新设福建分台的原因是为了应对“道梗”<sup>⑨</sup>，即道路不通的特殊状况，但我们也不

<sup>①</sup>《南村辍耕录》卷十“越民考”条，第135页。谓御史大夫拜住哥“自统军三千，曰‘台军’”，而同书卷二十三“造物有报复”条，第307页。则谓安安欲除掉余姚同知秃坚，“夜半率台军擒杀之”，可知“台军”之名号与建置，早在安安代纳麟摄政南台时就应存在了。拜住哥麾下的台军只是沿用其名号而已。

<sup>②</sup>《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迈里古思传》，第4312页。

<sup>③</sup>（元）徐勉之著：《保越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sup>④</sup>《保越录》，第5页。

<sup>⑤</sup>（明）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始丰稿校注》卷十四《故元明威将军平江等处水军都万户府副万户叶君墓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sup>⑥</sup>《元史》卷一百四十《达识帖睦迩传》，第3378页。

<sup>⑦</sup>（明）乌斯道：《春草斋集》卷八《送逊都月公赴山南廉访使序》，《丛书集成续编》第11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55页。

<sup>⑧</sup>《始丰稿校注》卷五《送笃禡平章还燕序》，第108页。

<sup>⑨</sup>“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衙门，尝奉旨于绍兴路开设，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北、江西、福建等处，凡有文书，北至南台，风信不便，径申内台，未委事情虚实。宜于福建置分台，给降印信，俾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北、江西、福建各道文书，由分台以达内台，于事体为便”（见《元史》卷九十二《百官志八》，第2334页）。

能排除福州分台的设置与绍兴行台急于摆脱张士诚的影响有关的可能性。

综上，张士诚对绍兴行台的态度是在军事上予以“保护”，在政治上加以干涉与利用。“保护”与干涉均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控制行台，利用其作为江南地区最高台宪机构的性质为自身利益而服务。

### 三、绍兴行台与朱元璋政权的关系

相较于张士诚对绍兴行台“保护”与利用并存，元末乱局的最终胜利者朱元璋与绍兴行台之间则完全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于军事对抗与人才争夺。

在军事对抗方面，正如前文所言，绍兴行台的建立本就是朱元璋攻克原江南行台治所集庆路的一个直接后果。在绍兴行台存续的约十年间（1356-1366年），行台官僚又多次与朱元璋部将在婺州、绍兴等地对阵作战。

婺州路（今浙江金华）是绍兴行台之分台所在地。所谓“分台”，盖指元代御史台和行御史台的临时派出机构，通常驻扎于诸道廉访司驻地，统领当地诸司从事监察工作。凡江南行台分台，一般情况下多委任治书侍御史坐镇统摄，如大德时南台治书赵秉政分台按治“江浙省臣为奸利”<sup>①</sup>，赵世延以“以治书分台浙省”<sup>②</sup>等等。绍兴行台成立之初，沿袭惯例由时任治书侍御史的帖木烈思<sup>③</sup>“分台于婺”<sup>④</sup>，坐镇婺州城中。

至正十八年（1356），朱元璋在与张士诚争夺浙西地区获得优势后，开始向元朝控制下的浙东地区扩展领地，派属将胡大海攻陷兰溪县（今浙江兰溪），随后又以兰溪为跳板攻打婺州城。婺州分台的最高指挥官帖木烈思在“义军”首领章溢和行枢密院石抹宜孙兄弟的帮助下击退了长枪军和胡大海的初次围城。但由于行枢密院佥事宁安庆与帖木烈思不和，打开城门向亲征至婺州的朱元璋投降，致使婺州城被攻破。结果元浙东廉访使杨惠、婺州达鲁花赤僧住皆在战斗中被杀，帖木烈思则被活捉。婺州之战最终以朱元璋的胜利而告终。

朱元璋与行台围绕台城绍兴的争夺战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至正十九年（1359）初，即胡大海在婺州之战结束后乘胜追击，进攻台城所在地绍兴路。在张士诚部将吕珍的协助下，时任行台御史大夫庆童暂时击退了胡大海的进犯。第二次则发生于朱元璋自称“吴王”前夕，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属将李文忠攻破绍兴城，张士诚所任命的行枢密院同佥李思忠与绍兴路总管衡良佐归降，而被张士诚所迫摄行台事的御史大夫笃禡则被李文忠俘获，押送至应天府，江南行台遂再次为朱元璋所攻灭。

此外，前述绍兴行台设置于福州路（今福建福州）的分支机构——福建分台亦在次年（1367）十二月为汤和率领的“吴军”所摧毁。因此，从客观结果来看，绍兴行台及其两个分台的三度覆灭，均是由朱元璋政权所一手造成的。

较之于军事进攻，朱元璋从元朝的行台官员中征辟人才无疑更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洛阳人秦从龙原为元江南行台侍御史，因集庆路失陷而避居镇江，徐达访得之，朱元璋遂“因邀从龙与同处，朝夕访以时事……事无大小悉与之谋”<sup>⑤</sup>，成功将秦从龙转变为自己麾下的谋士。绍兴行台治书侍御史帖木烈思于婺州路分台被攻克时被俘，朱元璋“以帖木烈思为集贤大学士”<sup>⑥</sup>，只不过帖木烈思趁机逃走，没有出仕朱元璋。另一名曾任职于绍兴行台的监察御史傅敏学也至迟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前归附了朱元璋，后以佥事之官衔参与到了吴

<sup>①</sup>（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十《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赵忠敏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8页。

<sup>②</sup>（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四《送萧孚有归庐陵并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6页。

<sup>③</sup>“帖木烈思”，其他史籍中又作“帖木烈思”。

<sup>④</sup>（明）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壑坡前集》卷二《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sup>⑤</sup>（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三十五《秦从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14页。

<sup>⑥</sup>（明）刘辰：《国初事迹》，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页。

政权的律令制定中<sup>①</sup>。至于绍兴行台末代御史大夫笃禡，在被朱元璋政权俘虏期间，“上既优待，授馆与粢，其至如归矣”<sup>②</sup>。朱元璋对待上述四名元臣的态度，足见其对绍兴行台官员招诱政策之力度。

元代台察官员队伍多由各民族的饱学之士所充任，朱元璋对绍兴行台官吏的招诱政策，一方面增强了其统治集团的治理能力，为其日后建立吴政权，乃至称帝做好了人才储备；另一方亦削弱了张士诚所控制下的绍兴行台，为朱元璋政权日后攻略浙西地区扫除了一大障碍。

#### 四、绍兴行台与方国珍政权的关系

至正八年（1348），因受到蔡乱头、王伏之等仇人逼迫，台州人方国珍揭竿而起，出海劫掠元江浙行省通过海运送往大都的漕粮。对于前来征讨或宣抚的元朝文武官僚，方国珍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时降时叛。

至正十二年（1352）初，随着红巾军起义席卷中原与江南，方国珍再次入海反元。当年五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夹攻方国珍”<sup>③</sup>。武力镇压未成，元廷又转而对方氏进行诱降，“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sup>④</sup>，二人“报国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户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纳其船，散遣徒众”，“国珍不从，拥船一千三百余艘，仍据海道，阻绝粮运”<sup>⑤</sup>，颇令江南行台头疼。直到1356年三月，随着方国珍的再度降元，方氏政权与江南行台的关系才缓和下来。

江南行台移驻绍兴之后，方国珍大致与行台上层官僚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对绍兴周边那些掌握着兵权的元朝州县官员，方氏与行台似乎达成了合力剪除他们的某种默契。代父纳麟掌握绍兴行台政务的行枢密院判高安安，视忠于朝廷，团结民兵的慈溪县尹陈文昭、绍兴路录事迈里古思和余姚同知秃坚为眼中钉，“以三人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安安方才诱杀秃坚，“方国珍亦执陈文昭，沈之海”<sup>⑥</sup>。当方国珍进攻绍兴属县上虞之际，时任绍兴行台御史大夫拜住哥不但不出兵收复城池，反而“愤迈里古思擅举兵，恐且生事”，而将这位出兵抵抗方氏的行枢密院判杀害<sup>⑦</sup>，造成本就薄弱不已的元朝统治力量内耗。

当绍兴行台面临反元武装的军事威胁时，方国珍也曾派其弟方国璋给予援助。“明年（1358）江东畔，兵陷建德，瞰绍兴，势殊鸱张。时南台移置绍兴，内外震动，省台驰檄旁午，公挥御多方，寇莫能犯”<sup>⑧</sup>。在这段史料中，“兵陷建德，瞰绍兴”的敌对势力正是朱元璋部将胡大海。由是可见前述至正十九年二月元军在绍兴路之战取胜，除了张士诚属将吕珍的奋战之外，可能也离不开方国璋的援助。

然而，绍兴行台与方国珍“合作”的结果无疑将造成方氏势力进一步扩张，进而令朝廷无所掣肘。至正二十二年（1362）以后的方国珍甚至宣称“省台贵臣，皆听吾命”<sup>⑨</sup>，可见其与张士诚类似，亦能够对绍兴行台的施政给与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

#### 五、小结

<sup>①</sup>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甲寅”条，第389页。

<sup>②</sup> 《始丰稿校注》卷五《送笃禡平章还燕序》，第108页。

<sup>③</sup>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第899-900页。

<sup>④</sup> 《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六》，第908-909页。

<sup>⑤</sup> 《元史》卷四十三《顺帝纪六》，第914页。

<sup>⑥</sup>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讥省台》，第307页。

<sup>⑦</sup>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迈里古思传》，第4311-4312页。

<sup>⑧</sup> （民国）黄瑞：《台州金石录》卷十三《大元赠银青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越国公谥荣愍方公神道碑铭》，《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1176页。

<sup>⑨</sup> （明）苏伯衡：《苏平仲集》卷十二《故元承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周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不难发现绍兴行台在与张士诚、朱元璋和方国珍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中均处于下风地位。“时南行台治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宪台纲纪不复可振，徒存空名而已”<sup>①</sup>便是对这种尴尬局面的真实写照。

就历史教训而言，绍兴行台未能协调好与元朝地方官员及其所率领之义军的关系。对于掌握了兵权的元朝地方官员，行台非但未加以合理利用和拉拢，而是与之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当是时，只有倚赖拥护朝廷的‘民兵’，钱塘江两岸的保障才有可能。可是，已经腐化的上层禁不住诛戮‘有功’，遂致仅存的希望化为乌有”<sup>②</sup>。相较于同僚，绍兴行台似乎更乐于同方国珍与张士诚这种对元朝阳奉阴违的枭雄进行军事“合作”，这种与虎谋皮的行为无异于引狼入室，造成了绍兴行台最终覆亡的结果。

【作者蒋介】邓文韬，宁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sup>①</sup> 《元史》卷142《庆童传》，第3399页。

<sup>②</sup> 王颀：《西夏人迈里古思与元末两浙的守护》//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3页。